

# 赫尔岑《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

刘文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是一部文学杰作,也是一座思想丰碑。它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是赫尔岑个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历史的写照;它是对19世纪中期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形象再现,揭示了“思想”在俄国成为一种“力量”的历史场景;它也是赫尔岑本人思想一个集大成式的表达。《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作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赫尔岑;《往事与沉思》;俄国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I1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3)02-0057-06

## 一、“随想”还是“沉思”

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沉思》的俄文原题为“Былое и думы”,在我国一般译为《往事与随想》。这个译名的最早使用者巴金,据说是接受了翻译家臧仲伦的建议<sup>[1]</sup><sup>4</sup>。巴金先生后在《往事与随想》第一卷后记中还提及:“回忆录的书名《往事与沉思》,我便是根据他(指臧仲伦。——引者按)的建议改为《往事与随想》。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sup>[1]</sup><sup>4</sup>巴金先生所谓“明明是随时的感想”,当然是准确的,是对赫尔岑这部回忆录写作方式和文体风格的准确把握,但问题在于,俄语中的“думы”较之于汉语中的“随想”似乎还是要持重、厚实一些;不是说“随想”就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巴金先生自己的《随想录》就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但问题在于,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是由散篇合成的思想著作,而《往事与沉思》则是一部结构完整的“编年史”和“自传史诗”;对于一部文

学作品而言,“随想”的译法的确比“沉思”更有效果,但问题在于,我们若自思想史的角度对赫尔岑的这部作品作更多、更细的阅读和理解,便或许仍会倾向巴金先生最初的选择,即“沉思”,因为这个译法能使我们更为强烈地意识到赫尔岑这部回忆录的思辨分量和思想史意义。辛未艾先生在其所译《赫尔岑论文学》中也译“沉思”<sup>[2]</sup><sup>5</sup>。

我们再来看看赫尔岑本人在该书《序言》中给出的“题解”：“这与其说是札记,不如说是自白,因此,在其周围才聚集起了这些自往事撷取来的回忆以及这些由沉思积淀下的思想。”<sup>[3]</sup>在这里,赫尔岑在“札记”、“自白”、“往事”和“沉思”这4个单词上都加了着重号(斜体),其中的“往事”和“沉思”2个单词还以大写字母开头。他给出了几对比照,即“札记”和“自白”,“回忆”和“思想”,“往事”和“沉思”。他既是在说明此书的体裁性质和写作风格,同时似乎也在强调此书的内容特征和思想意义,其中的“由沉思积淀下的思想”一句最能说明问题。

收稿日期:2013-01-04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刘文飞(1959—),男,山东菏泽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研究。

我们再来看看在这句话最权威的两种汉译。将书名也译为《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家项耀星将这段译文处理为：“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断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sup>[4]</sup>“随想”之译名的使用，使得这位赫尔岑的杰出中译者只好采取一种“换位”手法，实际让原文中的“думы”译成了“内心”，而将“мысли”译成了“随想”，因为，通过“随想”获得“随想”，通过“随想”获得“思想”，这就成了同义反复。巴金和臧仲伦的译本则译为：“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断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sup>[5]</sup>为了与“随想”呼应，俄语中的“мысли”也只好被处理成“思绪点滴”。显然，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两种译法都不约而同地对“思想”（мысли）一词有所回避。这一翻译上遣词造句的小问题或许也折射出了我们在阅读和解读赫尔岑《往事与沉思》一书时的某种特殊心态，即我们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将它视为一部纯文学作品，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其强大而又厚重的思想内涵。

## 二、“家庭苦难的墓碑”和“思想史的丰碑”

1850年，赫尔岑拒绝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要他回国的命令，从此成为一位政治流亡者。19世纪50年代初，欧洲大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出现深重的思想危机，恰在此时，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不幸和灾难，他的夫人娜塔莉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与德国诗人黑尔韦格的暧昧关系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而赫尔岑的母亲和小儿子又在一场海难中死去，经受不住打击的妻子于次年去世。悲愤交加的赫尔岑写道：“一切全都倾塌了，无论是共同的事业还是个人的事业，无论是欧洲的革命还是家庭的庇护，无论是世界的自由还是个人的幸福。”<sup>[6]</sup>为了摆脱噩梦，赫尔岑开始写作《往事与沉思》。他怀着一种“叙述近年生活的可怕历史”的愿望，要为自己和自己家庭的过去“立一块墓碑”，要将“听到和看到的一切”、“带来疼痛和苦难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在孤独和失望中清理思绪，试图通过写作来淡化内心的悲伤，同时也想借这个机会来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清算一下个人的生活”，在“沉思”中回首“往事”。

《往事与沉思》的写作过程持续了近16年（1852—1868）。《往事与沉思》的大部分章节在

赫尔岑生前即已面世，它们陆续在《北极星》和《警钟》上刊出，后又在伦敦、日内瓦等地出版多种单行本，但直到去世，赫尔岑并未最终编完《往事与沉思》，此书现今的“全本”结构为后世学者和专家之编纂。

《往事与沉思》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首先就在于，这是19世纪中期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家心路历程的典型显现，或者用赫尔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往事与沉思》的第二部《监狱和流放》曾被加上《伊斯坎德尔的札记片断》的副标题于1854年在伦敦出版，赫尔岑在这一“伦敦版”的序言中写道：“我决定开始写作；可是，一段回忆又唤起千百段回忆；一切陈旧的、处于半遗忘状态的东西全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幻想，青年时期的希望，青春岁月的豪迈，监狱和流放，——这些早年的不幸并没有在我心中留下任何苦涩，它们却像春天的雷雨一样冲刷了年轻的生命，使之变得坚强起来。”<sup>[7]</sup><sup>8-9</sup>《往事与沉思》是一部回忆录，赫尔岑要通过此书的写作来让个人的生活接受历史的审判。为此，他完整地回顾了自己的青春时代，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的形成，在俄国和西方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活动，与朋友的争论，与敌人的斗争，他试图弄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中究竟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用赫尔岑在此书另一版本（1866年日内瓦版）序言中的话来说，《往事与沉思》“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踏上其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sup>[8]</sup>。“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这是赫尔岑对自己这部回忆录的定性，它同时也十分确切地说明了此书的价值和意义。

赫尔岑曾有些担心《往事与沉思》的“个人色彩”过于强烈：“非常有可能，我过于夸大了它的价值，在这些轮廓模糊的特写中，含有许多仅对于我一个人才有意义的东西；也许，我从中读到的东西，要远胜过我写下的东西；写下的东西唤醒了我的梦境，成为只有我一个人才能读懂的象形文字。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听见，在此书的字里行间有一颗颗灵魂在跳动……也许，但正因为如此，此书对于我而言才愈发珍贵。多少年来，它代替了我的亲人和逝去的一切。”<sup>[7]</sup><sup>9-10</sup>但是，个人注定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而伟大的个人则更是会与历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对历史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往事与沉思》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伟人，这就使得他的生活经历绝不仅仅只是

一个个体的发展历史。在自己最初的自传试作《一个年轻人的笔记》(写于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赫尔岑就曾认为,个性化的经历中都程度不等地含有历史的折射和渗透。他还在这书里引用了海涅的一段话:“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和他一起生长、跟他一起死亡:在每一座墓碑下都埋葬着一整部世界史。”<sup>[2]129</sup>而《往事与沉思》中的“历史”,既是赫尔岑个人的成长史,也指赫尔岑所经历的那些重大事件所构成的俄国大历史,如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起义,40年代俄国知识界的思想论战,1848年的欧洲革命,俄国农奴制的废除,60年代的民粹派运动,等等。赫尔岑自己无疑也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大贵族出身,他显赫的革命家身份,以及他后来在欧洲政治流亡界的中心角色,使他与欧洲各国的政要显贵、文化名流和职业革命家都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19世纪中期俄国和欧洲的历史对于他来说仿佛是身临其境的。于是,我们在阅读《往事与沉思》的时候,就不仅能够了解到赫尔岑作为一位大思想家的人生经历,还能够目睹19世纪中期俄国和西欧思想界的整体风貌,通过赫尔岑这一“个体”和“个案”,窥见19世纪中期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进程。赫尔岑一部俄文版文集的序言作者将《往事与沉思》定义为“一部精神生活的艺术百科全书”:“赫尔岑是世界文学中思想生活最伟大的表达者之一,这一点最好的例证,就是他的天才作品《往事与沉思》,这部作品是一部俄国精神生活的独特的艺术百科全书。作为俄国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同倾向、不同时期之代表的各种人物,组成了一道无比丰富的画廊,背衬着历史、人民生活、政治、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广阔背景。”<sup>[9]</sup>

在《往事与沉思》中,赫尔岑在坦诚地展示其个性发展史的同时,也将更多的笔墨用来阐释他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正如此书的中译者之一项耀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和大事记;它有着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sup>[4]4</sup>这样一来,一部个人的自传体小说,同时也就成了一部鲜活的个体精神史和群体思想史著作,阅读《往事与沉思》,我们似乎时刻

可以听到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的一首诗中所言的“熟悉的逝者那活的话语”;这样一来,赫尔岑所竖起的这座“家庭苦难的墓碑”,也就成了一座“俄国思想史的丰碑”。

### 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对峙的生动写照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是19世纪俄国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个最为醒目的现象。作为当时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最重要成员之一,赫尔岑自然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回顾并反思两个派别、两大阵营的思想论争。他自己后来说,《往事与沉思》中写得最好的篇章,就是关于40年代思想斗争的那一部,即《莫斯科—彼得堡—诺夫哥罗德》。这一部记录了赫尔岑1842年结束流放生活回到莫斯科到他1847年出国这五年间的经历和活动,这段时间或许是赫尔岑个人生活和思想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年,而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和创作活动,或许就是他作为西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斯拉夫派展开的论争。

通过《往事与沉思》中关于19世纪中期俄国思想界、知识界的那些极具文学色彩、饱含怀旧情感的记述和描写,我们能获得一份关于当时那场思想论争的十分感性的印象,这里有具体的场景和鲜活的描写,也有深刻的思考和理性的评判。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成了赫尔岑的文学速写对象,随着赫尔岑的娓娓道来,他们纷纷步出历史的灰暗背景,将其生动的、富有个性的神情展现在我们面前。赫尔岑虽然是作为一位西方派来再现这段历史的,但他毕竟是在十几年之后来回顾这段“往事”的,因此,当年可能具有的小集团情绪无疑已有所淡化;再者,赫尔岑当时是在境外写作此书的,这又使得他的回忆可能更超脱、更自如一些。所有这些都使这段生动的思想史料具有了某种“中性”、“中立”的意味,因而也可能就是更为可信、更为权威的历史记录。

赫尔岑是在欧洲大革命后“市民化”、“世俗化”的西欧写作《往事与沉思》的,是在“家庭悲剧”连续袭来后的伤感中重温青春时期的社会和思想活动的,因此,他才分外眷恋、欣赏19世纪中期俄国他那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谈到他那一代人时不无自豪地写道:“这样一群天才的、有修养的、全面发展的、纯洁无暇的人,我后来在任何地方都不曾遇见,无论是在政界的精英中间,还是在文

艺界的当红人士中间。我到过很多地方,经历过各种生活,革命还把我带到了这些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我还是会问心无愧地重复我的这个意见。”<sup>[10]110</sup>当时俄国文人的活动场所除杂志和大学讲坛外,主要就是沙龙等社交场合,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基本上都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沙龙中进行的。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的说来,莫斯科当时刚刚步入智性的觉醒时期,由于无法谈论政治问题,文学问题便成了生活问题。一本好书的出现就构成一个事件;批判和反批判的文章都会受到十分仔细阅读和阐释……人类活动的其他所有领域都遭到压制,这使得社会中受到教育的成员只好步入书籍世界……”<sup>[10]152</sup>思想的论争是通过文学进行的,激烈的对峙往往是在温文尔雅的社交场所展开的,这就是赫尔岑为我们归纳出的当时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两大外在特征。

当时活跃的俄国大知识分子们在赫尔岑的回忆录中纷纷亮相,得到了十分传神的描写和刻画。“思想的疯子”恰达耶夫静静地站在莫斯科的沙龙里,构成一个“阴郁的谴责”、“否定的化身”和“活生生的抗议”;腼腆而又虚弱的别林斯基,体内“却隐藏着一股强大的、角斗士般的力量”,“一旦有人触犯了他那些珍贵的信念”,“他就会像只雪豹一样扑向对手,把对手撕成碎片”;格拉诺夫斯基作用于同时代人的思想武器,则是他“正面的道德影响”、“持久而又深刻的抗议”和“独立的思想方式”。那些被赫尔岑称为“友好的敌人”和“敌对的友人”的斯拉夫派思想家,自然也同样会出现在《往事与沉思》中。让人感觉惊讶的是,赫尔岑在写到斯拉夫派的那些代表人物时,笔端所流露出的也同样是亲切和眷念的情感,虽然其中稍稍多了一些讥刺和调侃。他这样谈起斯拉夫派的首领霍米亚科夫:“这是一个大脑十分聪明、灵活的人,他能力很强,又不择手段,他广闻博记,想象敏捷,他终生都在热烈地、不懈地争论。这个不知疲倦、从不歇息的斗士,时刻在触及和刺杀,进攻和追踪,引经据典,挖苦讽刺,威胁恐吓,直到把人逼进森林,要是不求饶就甭想走出那片密林,——总之,他会让那些为信念而战的人放弃信念,为逻辑而生的人丢开逻辑。”<sup>[10]156</sup>在以往的俄国文学史中,霍米亚科夫往往只被视为一位二流诗人;由于斯拉夫派及其文化历史意义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估价,霍米亚科夫在俄国思想史中的地位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读一读

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的相关描写,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具体地认识历史真实环境中的霍米亚科夫以及其他斯拉夫派人士。在为纪念另一位斯拉夫派重要人物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而写的一篇文章(作于1891年,原载《警钟》,被引入《往事与沉思》一书)中,赫尔岑最终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作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总结: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着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

无论是在他们的心中还是我们的心中,从很早的年纪开始,就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自觉的、炽烈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他们将这一情感视为回忆,而我们则将其当作预言,这种情感就是:对俄罗斯民族、俄国日常生活和俄国思想方式的无限的、全身心的爱。我们就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看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同一个<sup>[10]171</sup>。

阅读《往事与沉思》中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个个生动的场景,19世纪中期发生在俄国的那场激烈、严肃的思想论争似乎就像一场精彩纷呈的戏剧,历历在目地呈现于我们眼前。赫尔岑笔下的这些俄国知识分子,的确是俄国文化史上一群真诚而又可爱、坚韧而又富有个性化的思想者。赫尔岑自豪地写道:“试问,在当代西方的哪个角落里,你们能看到这样一群思想的隐修士、科学的苦行僧和信念的宗教狂?他们的头发已经斑白,可追求却永远年轻。”<sup>[10]42</sup>“思想的隐修士”、“科学的苦行僧”和“信念的宗教狂”,这便是赫尔岑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活动家们归纳出的共同特征。

#### 四、“思想成为一种力量”和“思想的力量”

《往事与沉思》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或许还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生动、概括地展示了在19世纪中期的俄国“思想成为力量”的场景和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是赫尔岑本人“思想的力量”之集中、具体的体现。

在赫尔岑看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对峙是俄国社会思想史上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阶段,因为此前发生在俄国的两个历史事件已为这场思想论争准备了前提。这两大历史事件就是: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812年,俄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战胜了欧洲霸主拿破仑,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但随着战后与西欧交往的增多,专制统治下的俄国与相对自由的西欧之间的巨大反

差却激起了一部分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引发他们的深刻思考,并进而导致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而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以及沙皇政府对这场起义的残酷镇压,又在俄国社会激起了新的抗争。赫尔岑曾自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后代”,这个称谓其实也可以用来指称与赫尔岑同时代的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而这一代人的思想成熟就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争。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到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再到40年代初的思想论争,——这就是赫尔岑勾勒出的19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在将1812年之前的莫斯科与1947年(赫尔岑出国的那一年)的莫斯科进行比较之后,赫尔岑激动地发现:“我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当时只有一个不满者的圈子,那是些离职的人,被贬黜的人,被辞退的人;而如今存在的却是一个由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构成的圈子。”<sup>[10]69</sup>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中,赫尔岑也曾这样谈到他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我们大家尚要参加十二月十四日,实在太年轻了。被这个伟大日子所惊醒的时候,我们已经只看到死刑与流放。我们被迫沉默,抑制住眼泪,我们深自韬晦,已经学会仔细思考自己的思想——这是些怎样的思想呀!这已经不是启蒙性的自由主义的观念,进步的观念了,——这是怀疑、否定、充满狂怒的思想。”<sup>[2]68</sup>在1825年之后,被赫尔岑称之为“历史的萌芽”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因这些孩子而惊愕的俄国也开始醒悟过来”<sup>[10]35</sup>。

赫尔岑在写到恰达耶夫时所发出的一个感慨是意味深长的,他写道,恰达耶夫这个人既不富有,也无高位,还受到沙皇等人的公开迫害,被目为“疯子”,可是渐渐地,在当时的俄国社会,上到大贵族和高官,下到小市民和军人,却都对他趋之若鹜,把他的只言片语拿来到处传诵,津津乐道于他的每一件生活琐事。从这一看似荒谬的社会现象中,赫尔岑敏锐地意识到,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俄国社会,“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已享有其可敬的地位”<sup>[10]142</sup>“思想成为一种力量”,于是,在当时的俄国便迅速涌现出了一群为思想而生、为思想而活并试图用思想来影响社会和历史的人。

赫尔岑的一生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一生,更是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一生,在他身上,有一种很早就被别林斯基发现被推崇的“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及其表达方式在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都留下

了深刻的痕迹和深远的影响。就像高尔基所指出的那样,赫尔岑一个人“就代表整整一个领域,就代表一个思想饱和到惊人地步的国度”<sup>[11]</sup>。伯林称赫尔岑为“19世纪中叶的伏尔泰”<sup>[12]222</sup>,或许也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往事与沉思》虽然不是一部纯理论著作,但其中无疑也积淀着赫尔岑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赫尔岑思想学说的集大成者,因为,赫尔岑是在自己的晚年回顾、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比如,通读完《往事与沉思》,我们便能清晰地梳理出赫尔岑“俄式社会主义”的演进过程,从莫斯科大学时期对圣西门社会主义学说的迷恋,到19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悲观,再到他在其“友好的敌人”斯拉夫派之理论影响下在俄国“村社”传统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根基,从而在恰达耶夫之后再次强调俄国的“后发优势”,即跨越西欧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对后来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列宁的国家学说乃至我们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比如,赫尔岑的个体自由学说也在此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伯林断言,赫尔岑与巴枯宁“一致以个体自由的理想为思想与行动中心”<sup>[12]98</sup>,在赫尔岑这里,“自由——特定时地之实际个体的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起码的自由行动范围对一切都是一种道德性的必需”<sup>[12]102</sup>伯林如今已被公认为一位自由主义哲学家,但在牛津大学教授杰瑞·史密斯看来,伯林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能就源自赫尔岑,而他们两人之间的中介或许就是俄国文学史家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米尔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写道:“赫尔岑始终更像一位政治家而非社会学家,其思想的核心也始终是自由而非平等。很少有俄国人能如赫尔岑这般强烈地意识到个性的自由和人的权利。”<sup>[13]</sup>史密斯写道:“米尔斯基关于赫尔岑启蒙自由主义的分析无疑对以赛亚·伯林本人关于赫尔岑的阐释产生过影响,伯林关于赫尔岑的阐释则是他对俄国思想所做阐释的基础”<sup>[14]</sup>。赫尔岑的“个体自由”还影响到了另一位俄国大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成为后者构建其哲学大厦的基石。在阅读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时,我们往往会暮然感到,这整部回忆录其实不正是在向我们展示一个精神自由的个体之诞生、发育和成熟的过程吗!换句话说,赫尔岑的个体自

由意识不仅体现于《往事与沉思》的字里行间,而且也见诸于它的表达方式。

《往事与沉思》是赫尔岑一生创作的顶峰,因为,无论是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赫尔岑还是作为一位杰出文学家的赫尔岑,在这本书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往事与沉思》是一部不朽的杰出自传,它在俄国文学史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对高尔基、阿·托尔斯泰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同类体裁作品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伯林在谈到此书时曾不无机智地称赞说:“也许因为他手撰的自传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他至今没有一部好传记。”<sup>[12]219</sup>然而,《往事与沉思》又不仅仅是一部传记,即便只就体裁意义而言,它的容量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回忆录或自传,这里有对历史和现实人物的特写,有日记和书信,有理论文章和政论,其作者是一个兼小说家、政论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师。《往事与沉思》是一部俄国文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厚重思想史意义的文学名著。在一部新近出版的《俄国哲学百科》中的“赫尔岑”词条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说法:“任何一位研究19世纪中期俄国哲学思想史的学者都不得不援引赫尔岑的自传史诗《往事与沉思》,甚至连弗洛连斯基这样具有深重宗教感的思想家,在对19世纪哲学生活的各种现象进行评价时也要援引赫尔岑,将赫尔岑当作最高权威。”<sup>[15]</sup>正是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赫尔岑不仅再现了“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同时还生动地展示了“思想俄国”的生成和发展,还对自己一生的精神世界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借助这部巨著,赫尔岑也把自己的伟岸身影投射在了俄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别林斯基在赫尔岑刚刚开始发

表作品时就作出的那个大胆预言无疑是正确的:赫尔岑不仅将在“俄国文学史”中占据要位,而且还将在“卡拉姆津的历史”中占有一席。

#### 参考文献:

- [1] 俄] 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 下册(全译本)[M]. 巴金, 臧仲伦,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 [2] [俄] 赫尔岑. 赫尔岑论文学[M]. 辛未艾,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3] ГЕРЦЕН А.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M]. М.: Госиздат, 1955, т. 4, с. 7.
- [4] [俄] 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 上卷[M]. 项耀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5] [俄] 赫尔岑. 往事与随想: 上册(全译本)[M]. 巴金, 臧仲伦,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1.
- [6] Под ред. НИКОЛАЕВА П. А.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M].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т. 1, с. 172.
- [7] ГЕРЦЕН А.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M]. т. 1, сс. 8-9.
- [8] ГЕРЦЕН А.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M]. т. 4, с. 411.
- [9] ЭЛЬСБЕРГ Я. Наследие Герцена. См. ГЕРЦЕНА.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M]. т. 1, с. 32.
- [10] ГЕРЦЕН А.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евяти томах[M]. т. 5, с.
- [11] А. И. Герцен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M].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 1953, с. 295.
- [12] [英] 伯林. 俄国思想家[M]. 彭淮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3] MIRSKY D S.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Dostoyevsky (1881)[M]. NY: Alfred A. Knopf, 1927, p. 272.
- [14] SMITH G. S. D. S. Mirsky, A Russian - English Life, 1890 - 1939[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3.
- [15] ПОД РЕД. МАСЛИНА М. 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M]. М.: Алгоритм, 2007, с. 121. Авторы статьи: ПАВЛОВ А. Т. и ПАВЛОВ А. В.

## Significance of Herzen's *My Past and Thoughts* in Thought History

LIU Wen-fei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Herzen's *My Past and Thoughts* is not only a literary work, but also a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As "the reflection of history in the man" and a comprehensive expression of Herzen's thoughts, the memoirs show Herzen's mental development, reappear the birth and the real life of Russian intelligentsia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and reveal the historical moment when "thought" became a power in Russia. The book has its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and awaits our further discussion.

**Key words:** Herzen; *My Past and Thoughts*;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责任编辑:郑红翠]